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鹤 高洪艳

墨西哥： 高端制造业异军突起

提起墨西哥，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玉米的故乡”、“仙人掌的国度”、璀璨的玛雅文化和古老的印第安文明。如今，摆脱了古老、封闭、贫困等词汇，一度被归为“新兴市场”的墨西哥，正被重新定位为“崛起中的大国”。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12年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指出，目前，墨西哥是拉美地区第一贸易大国和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里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墨西哥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二十国集团(G20)成员，被认为是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型工业国家之一。

另据记者了解，墨西哥本土市场庞大，发展势头强劲，是唯一同时被列入“迷雾四国”(MIST)、“金钻十一国”(NEXT-11)、“维他命十国”(VITAMIN)以及“薄荷糖国家”(MINT)等投资概念的拉丁美洲国家。同时，墨西哥还是世界上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最多的国家。受此带动，墨西哥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平板电视、黑莓手机和冰箱出口国，其在汽车、航天和其他很多领域的贸易排名也在攀升。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时，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391%，今天却只高29%。在10年里，墨西哥成功提升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促使瞄准美国市场的制造业厂家将工厂设在墨西哥。这大大推动了墨西哥制造业出口，抢占了“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的相当一部分份额。

更出人意料的是，墨西哥占据领先地位的并非服装等行业，而是汽车及零部件生产、计算机及数据处理设备、医疗器材及摄影仪器等“含金量”更高的行业。

“墨西哥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虽然与汽车出口强国日本、德国等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墨西哥汽车贸易的比较优势已经凸显，发展潜力巨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魏浩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墨西哥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及其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拥有大量汽车领域的科技人才、大量外资逐渐进入、配套和支撑产业不断完善、各种成本优势凸显、政府制订了汽车产业政策以及优先发展战略等。

魏浩指出，汽车工业的高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如汽车产品设计人员、汽车工程师等)、汽车研究所、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等。墨西哥在汽车工业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而根据墨西哥汽车零部件产业商会的最新统计，2012年，墨西哥汽车零部件产值达7500万美元，位居全球汽车零部件产业第五名。墨西哥汽车产业的发展也已惠及全球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截至目前，世界汽车零部件生产百强企业中的84%在墨西哥均有投资和生

魏浩评价指出，在墨西哥，依赖世界级的墨西哥零部件供应商，墨西哥的装配厂能够与美国、欧洲和日本汽车组装机相媲美，尤其是许多中型墨西哥公司，他们通过掌握核心竞争优势和发展一系列高附加值、顾客导向服务，已经在“国际代工”业务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印尼： 靠海吃海 发展“蓝色经济”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拥有1.3万多个岛屿，领海面积为32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0.89万公里，海洋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主要鱼货品种有金枪鱼、鲑鱼、鲨鱼、赤点石斑鱼及各种鲷科鱼类，主要鱼类分布在南中国海、巴厘岛、塞兰岛、苏拉威西岛、扬德纳岛等附近海域。目前，印尼约有400万人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产业。

印尼将“蓝色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实施海洋渔业建设纲领，重点发展海洋捕捞业、海洋运输业和海洋旅游业。而按照印尼海洋与渔业部的中期发展规划，印尼在2015年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海产品大国之一。

印尼海洋与渔业部部长沙里夫表示，预计2013年印尼渔业出口将增长到50亿美元，渔业部已经打开了中东和非洲新市场。

数据显示，2012年，尽管全球经济放缓，印尼渔业出口额还是高达32.8亿美元，在渔业方面实现的贸易顺差也达到了5.2亿美元。

中国首席东盟商务专家许宁宁对《中国贸易报》记者表示，尽管印尼是个海洋大国，海产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受到资金、捕捞设备和技术的限制，印尼本国的海洋捕捞业发展比较缓慢，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与当地政府或公司合作进入印尼水域进行捕捞作业。

据记者了解，中国自东盟进口渔产品数额居首位的国家便是印尼，中国已与印尼签署了多个渔业合作协定，双方的合作意愿都十分强烈。

在雅加达，印尼渔业局海产品加工及营销总司长马尔塔尼·侯赛因、印尼渔业协会副会长等人曾与许宁宁积极商讨中国与印尼渔业合作事宜。

2011年3月，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和中国渔业协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许宁宁和中国渔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中国与东盟渔业企业合作。

福建省是中国的渔业大省，2012海峡(福州)渔业周系列活动中特设中国-东盟渔业投资与贸易洽谈会，印尼积极参加，寻求与福建进行远洋渔业合作等机会。

为了抓住印尼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的契机，许宁宁建议，中国可在以下3个方面与印尼展开合作：

一是渔业贸易与投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以来，印尼渔业贸易与投资逐渐开放，为双方提供了贸易机会。中国与印尼可以在渔产品进出口、水产养殖业投资、渔产品加工业投资、水产品保鲜仓储设施、渔业工程投资等方面展开合作。

二是渔业技术与知识产权交流合作。中国与印尼的渔业技术差异较大，可以在捕捞技术、养殖技术及加工技术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采取技术投资或股权参与、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人才培养与交流、专家互访、科研联合等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

三是渔业关联产业合作。与渔业关联的产业主要是渔船制造和维修、养殖饲料加工、水产品综合加工、休闲渔业等，这些产业在各国之间差异比较大，合作机会比较多。

UP 新势力 之 薄荷糖国家

编者按：过去几年，“金砖国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是，2012年，“金砖国家”中除中国外，其他几国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滑。国际投资者认为，“金砖国家”存在政策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大、投资回报不如预期等问题，投资者已渐感失望，将更多目光投向“薄荷糖国家”(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四国)。

虽然这四国在经济发展特色上很难找到共同点，以至于记者接触到的很多业内专家都认为“薄荷糖国家”这一概念只是投资者打造的文字游戏，但是，毋庸置疑，“薄荷糖国家”市场自由度高，私营部门发展迅速，经济发展前景看好，其金融、能源及消费品等领域对投资者具有很大吸引力，在未来一段时间，清清凉凉的“薄荷糖”将会备受投资者喜爱。

尼日利亚： 人口大国正待农业复兴

老钟，一个在田间地头耕种了大半辈子的普通东北农民，到了尼日利亚的农场，成了受人尊重的“种菜专家”。日前，“老钟们”正不断奔向尼日利亚的“海外农场”，英国《独立报》撰文称他们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农民”。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都需从产油获利中抽取数百亿美元进口食品养活1.6亿人口。目前，尼日利亚的大米、小麦等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尼日利亚政府计划到2015年实现本地生产大米的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40%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大量树木被砍伐作薪柴，土地沙化现象在北部十分严重。一方面，大量土地荒芜，灌木丛生；另一方面，木材储备日益枯竭，急需重新造林。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木材生产国之一，每年采伐1亿多立方米。这些木材大多数作为燃料烧掉，小部分与进口木材一起制成锯木、胶合板、精细木工板和纸张供本国使用。旱季烧荒现象非常普遍，原因在于农民与牧民有一些利益冲突，烧荒可以防止牧民进入耕地。另一个原因是，烧荒后土地便于开垦。但是烧荒不仅污染环境，而且烧毁了地面落叶层，不利于耕地培肥。

地中海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的农场建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的凯比州与尼日尔州交界地带。公司最初的“拓荒者”刚刚来到这里时，有一种说法是“下雨找大树、找人爬大树”。下雨的时候，荒地无处遮挡，只能往树下钻。而找人的时候，因为荒草太密了，要爬到树上才能看到想找的人在哪儿。不过，几年之后，那里成了一望无际的稻田，地中海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也成为尼日利亚重要的战略稻种供应商。

除了投资，尼日利亚也十分需要农业技术方面的支持。据中国驻尼日利亚农业南南合作专家组测算，尼日利亚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中国的1/10到1/3。从2003年开始，中尼两国政府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了合作项目，以支持尼日利亚的国家粮食安全计划。到现在，中国已经派遣了数百名农业技术专家赴尼日利亚，向当地民众传授农作物栽培、农田水利、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先进技术。

尼日利亚的复兴农业计划得到了国际投资方的支持和国内一些私营企业的响应。据报道，非洲发展银行今年1月已同意为此投资1.5亿美元。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国际援助项目也同意为其提供支持。国际农业巨头嘉吉、先正达等正考虑在尼日利亚投资建厂，而尼日利亚首富阿利科·丹格特也承诺投资8000万美元用于建设生产番茄酱和菠萝汁的工厂。

中国企业也看到了尼日利亚农业复兴带来的机遇。据悉，尼日利亚农业部制定了用本国的优质木薯粉替代40%以上进口小麦面粉的目标，一家中国企业的代表向记者表示，他们已赴实地考察，打算在尼日利亚投资建木薯粉加工厂。

土耳其： 通过改革实现凤凰涅槃

在鞑靼语中，“土耳其”意即“勇敢人的国家”，这似乎解释了在中东的战乱格局中，土耳其何以能取得霸主地位。虽然土耳其在建国后的近90年时间里发生了不计其数的军事政变，但是，土耳其政府一直深信，解开这一“土耳其魔咒”的钥匙在于发展经济以及推进城市化，并辅之以适当的教育。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罗爱玲介绍，历史上的土耳其是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城市发展缓慢。但是，二战后的土耳其掀起了一股汹涌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土耳其从此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事实证明，土耳其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民一旦富裕起来，过上伊斯坦布尔式的多元化现代城市生活，就会慢慢放弃传统的宗教偏执。而且，在城市化浪潮的带动下，富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助推土耳其经济步入良性、快速发展的轨道，极大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从而为土耳其应对中东变局和实现地区崛起堆积起充足的财富和丰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丁工指出，自2003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接管政权后，土耳其政府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使得该国GDP增速逐渐维持在中高水准甚至一度超过8%。土耳其一跃成为欧洲、中东地区经济增长最快速、赶超势头最强劲的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又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经济的恢复效果远超各界预期，成为世界经济体中最闪亮耀眼的“新星”之一。

如今，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并稳居中东-伊斯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宝座。土耳其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引来全球关注和赞叹的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其上行空间和潜力容量的一致看好：土耳其先后跻身“迷雾四国”(MIST)、“展望五国”(VISTA)、“灵猫六国”(CIVETS)、“金钻十一国”(NEXT-11)和“薄荷糖国家”(MINT)等顶级新兴经济体序列，被许多政经评论家和国际组织誉为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范例。

在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土耳其竞争力实现了重大超越，排名比上年跃升16位，综合排名列第43位。

丁工表示，短短10年时间，土耳其经济总量由250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8000亿美元，从贷款国摇身一变成为债权国，从偏居一隅的“西亚病夫”崛起为全球瞩目的“安纳托利亚小虎”，凤凰涅槃般地将一个全新的中等强国呈现于世人面前，所以，土耳其能够在应对中东地区动荡局势的同时，不断扩展权力和影响，借剧变之机实现崛起。